

# 相思一籬筐

## 也是名人羅曼史

●李梅山（香港作家）

### 孫文別娶德叔說謊

#### 孫科代父請母離婚

百歲老人鄭卓是孫中山先生的同鄉，廣東香山縣翠亨村人。他對人說，他平生只說過一個謊，至今耿耿於懷。

原來，當年孫中山先生要和宋慶齡結婚，寫了一封坦白而懇切的信，請他元配盧夫人同意和他離婚，此信準備叫孫科親自帶回家去，面交他母親。孫科既不敢違背父命，又不敢得罪母親，自度很可能會挨打，不如拉着德叔（即鄭卓）去，以便解圍。

鄭卓說，他帶着孫科回鄉去見盧夫人時，硬着頭皮，把中山先生的信呈上，預備承受最不堪設想的後果！那知夫人早已知道來意，她看了中山先生的信，毫不冒火，說「阿卓你來得正好，我正要問問你，這位宋慶齡小姐，你一定見過多次吧？長得很美嗎？鄭卓知道他這時的的確確是一言九鼎！他只好違背良心慢慢搖頭說，這位宋小姐，是在外國讀洋書的，相貌長得并不好看。夫人聽了他的話，立即對兩人表示她爲了國家而犧

牲自己，同意離婚。并叫鄭卓和孫科馬上回上海去復命。

鄭卓現還健在，今年一百歲，定居澳門。

### 蔣百里氣難伸自戕 左梅歸籍治癒將星

一九一三年六月十八日，保定軍官學校尙武堂，二千多名軍官生肅立着，聽校長訓話：「我對不起大家，我沒有能改變積習已久的局面……」突然，校長拔出手槍，「咣！」他倒下了……

校長名叫蔣百里，一八八二年生於浙江海寧硤石鎮。他留學日本六年。在士官學校時，他同蔡鐸、張孝淮被稱爲「中國三傑」。畢業時，他成績榮登榜首，由天皇親授寶刀。然而在昏庸的清廷統治下，那有施展才智的地方。

一九一二年多，由段祺瑞向袁世凱保薦，他當上保定軍官學校的第二任校長，授陸軍少將銜。他任用賢能，撤換無能之輩，得罪了上司，結果事事掣肘，改革計畫付諸東流。他痛苦地決定以身殉職來感動當局。所幸的是，在他扣動槍支的一刹那，在旁的護兵推偏了槍口，子彈只傷了

肺部。蔣百里生命得以保存。但治癒他肉體和精神創傷，并使他生長的勇氣的却是左梅！

左梅原名左藤屋子，一八九〇年出生在日本北海道新渴縣。從日本護士助生專門學校畢業後，她被派到日本駐華使館任護士。

蔣百里自殺引然軒然大波，袁世凱怕衆怒難犯，請了信任的日本醫官和助手去救治。蔣百里的傷勢一天天好轉，但他仍下了死的決心。一天，左藤在整理床鋪時，發現蔣百里枕頭下有不少安眠藥片。她帶着女性的柔情，似嗔似怒地說：「你怎麼能有這樣的念頭呢？這是逃避責任的行爲！人生本來有多少艱難險阻，應該迎戰，不是退却。」她的話感動了他。他長長嘆了口氣，向左藤訴說了自己的抱負。他的愛國熱情和凜然正氣深深感動了她，她流下了淚說：「你們中國不是有句俗話：『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』嗎？你自殺後震動全國，說明今後還是大有可爲的。」此時，他的愛慕之心萌動。後來，幾經波折，有情人終成眷屬。

婚後的生活異常美滿，左梅熱愛和體貼丈夫，她樂觀開朗的性格感染了蔣百里。他不再抑鬱

，他的進取心又重新復活起來。

不久，蔣百里參加了蔡鍔在雲南發動的護國運動。他時而參贊戎機，時而著書立說。這是他一生最燦爛的時期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本侵略軍在盧溝橋發動了侵略戰爭。左梅痛徹心肺，她和大家一起高喊：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她變賣了首飾，購買藥品與紗布送到前線。她又出現在救護傷兵的行列裏。她說：「我已不是左藤屋子，我是中國的左梅。日本侵略者是我的敵人！」

一九三八年十月底，蔣百里一家到了廣西柳州。十一月四日深夜，在宜山縣樂羣旅館內，蔣百里突然心臟病發作，當地缺醫少藥，左梅全力搶救無效，中國的一顆將星熄滅。

作為日本人的左梅，她把自己的命運與中國人結合在一起了。一九七八年她在北京逝世。七年後，她的三女蔣瑛（錢學森夫人），把左梅的骨灰盒與蔣百里合葬在杭州萬松嶺下。

## 張大千不收女弟子 討好姑媽娶得嬌妻

我國著名國畫大師張大千一生娶過四位妻子，第一位是曾慶蓉，第二位是黃凝素，第三位是楊宛君，最後一位是徐雯波。一九四九年張大千離開大陸去巴西，後又到台灣定居，徐女士一直陪伴在他的身邊，直到一九八三年去世。

一九四三年，張大千對敦煌莫高窟壁畫考察完畢之後回到成都。其時，他的第二任妻子黃凝素已有外心，整天在雪齒牙刷廠老板娘那裏賭博

，有時還整夜不歸，張大千非常氣憤，動手打過她幾次，黃氏便提出離婚要求。然而，張大千不予理睬，因為幾個孩子係她所生。

一天，張大千在家中大風堂上發悶，大女兒心瑞帶了一個女同學來家。當女兒把這同學領進拜見父親時，張大千幾乎看呆了。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美麗嫻靜、風度幽雅的姑娘，於是一腦子的煩悶頓時化為烏有。這位小姐名叫徐雯波，成都人，住在成都姑母家，平時喜愛繪畫。她聽說心瑞的父親就是著名畫家張大千時，便提出要心瑞帶她去看張大千作畫。在明白了徐小姐的來意之後，張大千高興地拿出自己的作品給她觀賞。徐雯波被這些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，於是提出要拜他為師。張大千十分樂意，但轉而一想，又婉言拒絕了，因為他忌諱師生戀。然而他答應徐雯波可每天來看他作畫。

日子久了，張大千發現徐雯波不僅美麗溫存，而且從無驕嬌之態，便很想娶她為妻。

有一天，他們正在大風堂談論書畫，忽然警報響起——日機將來空襲。張大千家中此時尚未建造防空洞，徐雯波便說姑母家有很大的防空洞。張大千一下子意識到這是個不可多得的好機會，便立刻跟着徐小姐躲進了她的姑母家。這時徐雯波對畫家已產生了好感，也看到了對方對她有意，並且知道他和黃氏的關係危在旦夕。

張大千私入徐家，給黃氏抓到了把柄，她便以此為借口，堅決要求離婚。張大千有口難辯，便答應了。張大千離婚後，每月不論有無空隙，他都要去徐家，一面善事其姑母，一面與徐雯波

增進感情。

徐雯波的姑母知道張大千很有名氣，也想想他作畫。張大千乾脆在徐家設置了畫案，還常幫助徐家做些事，由於張大千頭腦靈活，又善於處事待人，姑母對他也很有好感。一日，張大千突然提出要徐雯波結婚，姑母得知驚得目瞪口呆。她開始堅決反對，後來聽說侄女已有身孕，也只好答允了這門親事。

一九四九年四十八歲的張大千與十八歲的徐雯波正式結婚。

## 張友鸞串演西廂記 娶得崔娘白首偕老

張友鸞，安徽安慶人，曾受業於邵飄萍、郁達夫、徐志摩、許地山諸先生，與張恨水、張慧劍合稱「新聞界三張」。他的經歷頗多變故，有一樁事却始終如一，那就是他和崔伯蘋小姐的婚姻。說來也巧，夫妻的生日都在十一月十日，只是崔伯蘋長張友鸞一歲，而且二位的姓氏恰合了『西廂記』男女主人翁的姓氏。須知張友鸞步入文壇，第一部關於古典文學研究的著作就是『西廂記』批評與考證。因此，「張郎」和「崔娘」的稱呼，從年輕時代起便掛在朋友們口頭。

提起二人的羅曼史，既沒有「兵圍普救寺」，也不曾請紅娘傳書送簡。據「崔娘」回憶，當年她在安慶讀中學，總見個恂恂書生徘徊於書攤前，老師指點說，這書生便是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張友鸞。一九二二年，「崔娘」到北京讀大學，恰與「張郎」同窗，於是相識。一九二三年，

「崔娘」回家鄉執教，「張郎」在北京與焦菊隱、周紹鈞等合編『文學周刊』，二人天各一方，却已情深意篤。「張郎」看到棗樹，便聯想到「崔娘」喜啖蜜棗，這有『語絲』上「張郎」的『積水潭前』為證。有情人終成眷屬。一九二六年正月初十，二人在家鄉洞房花燭。朋友來賀，少不了引出『西廂記』的話兒來。周作人送的條幅引『西廂記』唱詞云：「一個是文章魁首，一個是仕女班頭。」張恨水賀詩云：「銀紅燭下雙雙拜，今生完了西廂債。」

張友鸞先後在『世界日報』、『民生報』、『中山日報』、『立報』、『新民報』等十數家報紙工作，還與張友漁等合辦過『國民晚報』，年輕時即斐聲報壇。一九三三年，他籌劃自辦『南京早報』，因阮囊羞澀，有個地方軍閥聞訊表示，只要肯依附於他，即可出資相助。張友鸞堅決拒絕，寧肯不辦這張報。這時，多虧夫人欣然解囊，變賣了首飾，扶助丈夫辦起了『南京早報』。在以後的辦報生涯中，「張郎」時時得「崔娘」的支持。他辦報半生，窮愁潦倒半生，夫人「齋鹽日月不嫌貧」，處處體貼入微。辦報紙不分晝夜，難得與家人同桌而食，「崔娘」就備一小爐，將丈夫愛吃的飯菜置於爐上，使他隨時回到家總有熱飯吃。對於這一切，「張郎」自覺無以為報，便在他的『湯顯祖及其『牡丹亭』』一書中題：「送愛妻蘋。」張友鸞辦報之外的事業是古典文學研究，若是偷得浮生半日閒，便會出現夫妻酬唱吟和的情景；或是「張郎」弄簫，「崔娘」唱一曲『皂羅袍』：「原來姍紫嫣紅開遍……」

抗戰爆發，舉家遷往四川。張友鸞在『新民報』工作，後來又到重慶，在大田灣的一座草房中栖身，仍然座上客常滿。抗戰勝利後，張友鸞在南京辦『南京人報』，寫新聞、寫小說、寫雜文，一枝筆淋漓酣暢，嬉笑怒罵皆成文章，所以聶紺弩贈詩云：「新聞記者筆饒雄。」

大陸易權後，夫妻雙雙進京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，研究整理古典文學。豈料張友鸞「文齊福不齊」，一九五七年被封為右派，從此夫妻進入「賤老」時代。及至「文化大革命」，二老已經退休，却仍被趕到又小又黑的西廂房裏，真正偏安「西廂」，一住十幾年。其時張友鸞正患胃病，每天却要出去掃街，接受「改造」。一天，「造反派」殺到，捉走張友鸞，一夜沒消息。「崔娘」獨守長夜，心急如焚，「寂寞淚欄干」，本來深度近視的雙眼更壞了，從此目力日衰，直至失明。環境惡劣，老兩口相依為命，依然自得其樂。白天，一個出去掃街，回家時順便買點菜，另一個在家摸索做家務，等丈夫回來。晚上，「張郎」濁酒一杯，禿筆一管，仍舊是浮白寫作。「文革」結束，他拿出了一厚本『古佛經寓言』底稿。而「崔娘」的主要任務是承攬家務，維持家計。有時夫妻與起，買上幾毛錢肉餡，「崔娘」撻肉圓，「張郎」掌勺炸，夫婦協作燒「獅子頭」。

不戚戚於懷，聶紺弩寫他「包袱三千種，心胸五百年」，正是這豁達性情的真實寫照。而「崔娘」的最大特點是閑不住，目失明，總要找點事幹，時刻處於運動狀態，至今她常拄根棍子，自己摸下樓去，更重要的是幾十年同甘共苦，兩人相依為命，互相成為生存的依賴。

### 黃震與謝冰瑩之戀 烽火漫天各奔東西

一九三三年秋，女作家謝冰瑩到廈門省立中學任教，恰好與黃震共事。他倆經歷頗為類似：謝冰瑩早年為反對封建包辦婚姻從湖南新化家鄉出走，一九二七年，她作為中國第一批女兵挺進在北伐的行列。大革命失敗後，她從上海子然來到福建。而黃震早在福建仙遊故鄉讀書時，就是一位有抱負的熱血青年。後來他到北京高師（北師大）習生物，但對文學也頗興趣，他很欽佩謝冰瑩的才華。當年謝冰瑩年僅二十七歲，却已斐聲文壇。她在北伐途中寫的『從軍日記』，以及其他長篇、短篇小說，都以質樸無華的筆觸描繪了青年的苦悶、掙扎和抗爭，勾起黃震心靈上的共鳴，文學成為他倆愛情的媒介。

後來，他們去長沙，共同的思想基礎，使他倆很快結為伴侶，住在秀麗的妙高峯之麓。謝冰瑩從事創作，黃震在中學教生物課，這是他倆生活上最美麗的時期。

他倆在事業上互相鼓舞，不同的專業互相滲透在他們生活中。謝冰瑩常陪黃震到郊外捕捉昆蟲，採集花草，制作標本，而黃震則幫助謝冰瑩

剪輯、整理文稿，聽她講文學，談創作。夫婦相勸、相助、相敬。純潔美好的愛情化爲他們事業上的動力。

一九三五年初，謝冰瑩東渡扶桑，入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院學習。三月間，黃震也到東京。他們租居於一個山水清幽的櫻花林裏。黃震從國內帶去謝冰瑩的十六冊日記和最近兩年的幾十萬字散文、游記、小說、詩歌等，原想好好整理一下，但不久謝冰瑩因宣傳愛國思想，被日本憲兵逮捕，囚禁於獄中，日記文稿統被沒收，黃震也被株連入獄。可是嚴刑拷打動搖不了中華兒女的堅貞氣節，三周鐵窗生活，他倆生死以共，相濡以沫。謝冰瑩後來回憶說，鬥爭「更增進了我們的愛情，我們是共過患難的，我們的愛情是偉大的，尊貴的。」

他們被放逐回國後，謝冰瑩寫出一部報告文學『在日本獄中』，憤怒地控訴了日本法西斯的暴行；黃震還協助她整理現後餘稿，編了一本散文集『湖南的風』，并以維特筆名代寫編後，作爲他們在日本獄中遭遇的一個紀念。

此後，他們流泊於桂林、南寧、梧州一帶，雖然生活清貧，但他們互相鼓勵鞭策，直到抗戰爆發前，黃震受聘於南昌中正醫學院，他們才暫時結束了浮萍般的流沙生活。一九三七年暑假，他倆到長沙岳麓山避暑，就在這時，驚天動地的抗戰炮火聲震破了他們寧靜的生活，熊熊的烽火召喚着謝冰瑩再度從戎。黃震毅然支持她重披戎裝，再上征途。同年九月，謝冰瑩在長沙發起組織「湖南婦女戰時服務團」，自任團長，率部開

赴武漢，轉戰江浙一帶。黃震曾往前方探望，但是爲了民族的生存和抗爭，他們深明大義，只好割斷繾綣纏綿之情，在炮火紛飛的戰地告別。

八年抗戰使多少人流離失所，而黃震與謝冰瑩也不幸在戰火紛飛中分離了。由於戰亂時期郵件來往困難，音訊日稀。一九四〇年謝冰瑩在西安主編巨型文藝刊物『黃河』，黃震曾多方設法想前往西北，但因交通阻礙，遲遲未能成行。此後他們失去聯繫，生死存亡彼此不知。等到抗戰勝利後，黃震才知道，謝冰瑩以爲他已死，已同賈伊箴重新結合。賈原籍山東濟南，長於音樂。黃震極爲悲痛，但十分諒解冰瑩。他不勝感慨地說：「在那抗戰年代，整個國家與民族都處於動蕩中，個人的一點悲歡離合，又算得什麼！」

師大任教。一九四八年她受聘於台灣師院（今台灣師大）教職，她鑒於台灣光復不久，亟待傳播文藝種子，因而欣然東渡。賈伊箴也隨之去台灣。謝冰瑩在台灣任教之餘，創作甚勤，著有長、中、短篇小說、散文、游記、論文及兒童文學三十多種。一九七四年退休後居美國。

大陸易權後，黃震曾任莆田一中校長，其後調任福建省博物館館長、福建農學院教授。而在他家裏一直掛着一幅謝冰瑩的戎裝照片，紙質發黃，但照片後題簽仍清楚可辨：

「不滅倭寇誓不生還  
冰瑩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於武漢」

這張照片，寄託了他對曾經共同生活過的妻子謝冰瑩的深切懷念，一直到他逝世爲止。

中外文庫  
之二十八

# 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著  
定價玖拾元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，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
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